

評介黃自進、潘光哲編， 《近代中日關係史新論》^{*}

羅皓星^{**}

黃自進、潘光哲編，《近代中日關係史新論》。臺北：稻鄉出版社，
2017年。816頁。

壹、前言

為因應現在身處的局勢，人們總是希望在過去的歷史中找尋現在問題的解答，對東亞而言，其情況更為明顯。位於東亞的兩個大國——中國與日本，在近兩百年中存在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兩國之間有著密切的互動，而在互動當中，可以看到兩國在邁向近代化國家過程中所遭遇的種種波折，從這些波折中，更可以了解到中日關係各種複雜的面向。

近年來，中日兩國學界開始針對中日關係的各種關鍵問題共同展開探討，亦逐漸取得一定的成果。與此同時，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成員為骨幹，結合日本、中國、美國等地之學界同好，並以「近代中日關係的

^{*} 本文承蒙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意見，謹此致謝。

收稿日期：2019年6月3日；通過刊登日期：2019年7月2日。

^{**}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多重面向（1850-1945）」之名義，召開一系列工作坊與學術會議。該研究群的成果頗豐，其中《近代中日關係史新論》即是由該研究群所召開的三次學術會議所提交之論文匯集而成。該書展現出近代中日關係研究的最新成果，也是海內外華人學者對於中日關係史的研究心得。綜觀此論文集的17篇論文，分別在三大面向展現中日關係史的最新成果，亦展現一定的研究深度。

貳、內容簡介

第一個領域為「內外交纏的政軍糾葛」，探討群體與群體之間的交流與紛爭，以補足傳統政治外交史的不足。所以，在這個面向所收錄的論文即著重在此，旨在探討兩國群體之間的互動對於中日關係所造成的影響。

姜克實的論文從日本近代政治家犬養毅與保皇黨人的關係談起，進而探討其政治理念。他認為，比起革命黨，犬養毅其實更為贊同梁啟超的立憲派之政治理念，並希望梁啟超的立憲政變能夠取得成功，因為立憲派的政治理念更能符合日本各方的利益。至於犬養毅與孫文之間，則僅是朋友之間的交誼，從兩人的交誼之中，亦能看出犬養毅浪人性格的一面。黃自進則探討孫文與蔣介石兩人政治理念中的日本因素。不管是前者的平均地權理論，還是後者的新生活運動，在其看來都與他們在日本的經歷有關。例如孫文與宮崎民藏交流有關平均地權的認識時，就有受到日本推動土地改革運動的影響；而蔣介石因受到德川時代提倡陽明學有成的經驗啟發，所以在其當政時即大力提倡「知行合一」，以為推廣。從孫、蔣兩人的例子，可以看到日本因素對中國近代政治理念的影響。而王新生是以施存統為例，探討留日學生與早期共產黨之間的關係。施存統所代表的留日學生，在中共早期建立的過程中有著重要的角色。他們在日本留學時期受到河上肇學說的影響，並開始思考如何通過改善社會各階層的地位與生活，來建立一個近代國家。但隨著國內外局勢的變化，加上蘇俄介入中國共產革命，讓中國成為國際革命戰線的一部分，因此，中共開始強調階級革命的重要性。這與中共剛成立時的理念產生衝突，進而使核心的留日學生逐漸脫離中共革命的行列。但是，在其後中共對自我來源的詮釋中，往往有意無意的忽略留日學生在早期建黨中所扮

演的角色。

鹿錫俊探討1930年代中期蔣介石的外交路線問題，他把重心放在蔣介石對於中、蘇、日三國互動的視野，以重新審視蔣介石的外交戰略問題。在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一直以「中立謀日蘇相互牽制的戰略目標」為行事準則，期在日蘇兩國之間取得緩和的空間。在1935年冬華北事變後，因為日本對蘇聯採取強勢，讓蔣轉向蘇聯，不過，由於蔣介石對於共產主義的不信任，也讓蔣對於蘇聯處處提防。因此，在審視蔣介石的外交方針時，應注意到其複雜性。劉傑從中國通日本外交官來探討日本對中國外交的雙重性格，在文章中對於1935至1937年前後中國政府的「知日派」與日本政府的「中國通」所展開的交涉過程進行探討，他認為，由於廣田弘毅和蔣介石都有意願通過外交途徑解決中日之間的種種難題，因此，有吉明等中國通欲通過經濟合作的方式，讓因華北問題而陷入緊張的中日關係得以緩和。但是，軍部在華北問題的強硬態度，讓外交官們的施展空間受到限制。同時，外交官在滿洲國問題上亦無法與中國取得共識，亦讓他們無法在外交上有所進展；不過，在戰後的中日關係上，中國通就發揮了他們的功用。趙軍則對於日軍在戰時所進行的宣撫工作進行探討，並以中國各地區的留日同學會為切入點。清末以來，由於留日人數眾多，並有不少人士回國後從事各種工作，也為日軍在戰爭時期的宣撫工作，提供了可供運用的人脈。不過，由於真正有志於中日親善的知日派不願為日軍工作，讓軍部的構想無法實現，而大亞洲主義的口號，亦隨著軍事上的失敗而走向敗亡。

第二個領域為文化交流，以此作為詮釋中日交流的一個重要面向。王晴佳探討明治史家如何在傳統與西方史學中取得平衡，進而另闢蹊徑的過程。他首先回顧了江戶時期儒家學術在日本的發展，指出由於受到清儒的影響，江戶學術表面上走向考證的道路，但是，日本學術傳統仍以折衷派為主。明治以後，西化的風氣一度盛行，惟傳統學術仍有著重要的影響力。當時的史家如重野安繹等人，仍然致力在西化與傳統中調和折衷。該文通過修史館的成立，說明日本學者在國家走向西化道路的同時，仍不忘重振傳統學術規範的心態，而日本學術中人對於歷史的態度已出現變化。其後，東京大學創立時，亦在校內設立古典講習科，雖然為時不長，仍培育出一大派漢學家如市村瓚次郎、服部宇之吉等人。同時，修史館調整方向，進行編纂《大日本史》的工作，而隨著重野安繹等人的加入，修史

館成員對近代歷史意識亦逐步提升。在重野的領導之下，修史館得以開展官修正史的工作，雖在傳統歷史寫作的影響下，仍加以修正其史書體例。當時日本已經出現一些受到歐洲史學影響的作品（如《薩摩叛亂記》，在王晴佳看來，該書就是日本史學吸收蘭克史學精髓的證明），而蘭克的弟子利茲亦前往日本訪學，協助日本史家將歷史研究演變為一門專業化的學術（如《史學雜誌》的創刊），並強調考據的重要性。利茲影響重野安繹等人的作品，促使他們對於體例做出更多的改進。在這種狀況之下，日本史學的演化亦影響到同時期中國的史學。

除了史學外，中日兩國之間的文學交流亦是一個受到注意的課題。陳力衛以譯詞為例，探討中日文翻譯的問題。他指出由於嚴復對於白話文的排斥，因此在其創造譯詞時，基本上沒有利用19世紀以來傳教士的漢譯西書與英華對譯辭典中的新詞、新概念，致使他在與梁啟超的文體大戰中屈居下風。劉建輝則從文學史的角度來看中日關係的演變。他指出，從史實上可以看到中國近代文學的發展與明治以來新文學思潮的引入關係深厚，但是，由於兩國民族性的差異，讓兩國文學的風格漸行漸遠。

其他文章亦著重在以人物為個案，探討中日文化交流的不同面向。如陳繼東通過對淨土真宗高僧小栗栖香頂訪問中國的個案，看到日本佛教人士觀察到中國佛教的不振，提出在中國傳播日本佛教的想法，並在之後付諸實行。不過，小栗雖然想要以日傳佛教加進文明開化等元素，以圖振興中國佛教，但是，在他們傳教的過程中，也顯露出國家主義的性格，最後致使他們的傳教事業遭受挫敗。潘光哲從根本通明與吳汝綸的交往個案中，探討中國士人如何通過對日本教育事業的考察，逐漸摸索出一套日本模式；而吳汝綸與根本通明通過新式報刊的文字交往，亦是前所未有的體驗。賴毓芝則以一位被視為「支那通」的日本浪人——岸田吟香為例，探討1880年代中日兩國書籍技術交流的狀況。她以印刷術作為切入點，重新探討以往岸田吟香研究所忽略的問題——即其作為文化中介角色的影響。岸田吟香一方面引進銅版技術，並引進銅版印刷品，惟他了解到中國文人並不容易接受新的書籍形式，因此亦根據中國士人的喜好作出修正。從岸田吟香的例子可以看到，物質、技術、文化等並不一定僅存在單向直線的關係，而是以彼此交錯的方式來創造歷史。戰曉梅的論文描述日本兩個畫界團體前往中國開辦畫展的經過，以及其在中國所引起的迴響。日本畫界人士或許有受到政治上的影

響，並意圖通過畫展來達到中日親善的目的，但是，中國畫界從畫展之中，亦可以得到畫風的啟發。

第三部分則是討論中日兩國在政治經濟上的博奕。該書收錄的4篇論文，都是探討日本在進行擴張過程中的種種面向。林志宏探討滿洲國時期的地方自治思潮，他指出通過地方自治口號的提出，日本得以成功控制滿洲國的地方基層社會，而不少日本人士亦積極投入自治運動，以彰顯自我的政治理念。日本當局巧妙利用「地方自治」這一口號，將中央集權置入滿洲國的統治上，總務廳得以成為滿洲國唯一的行政中樞，而投入地方自治運動的日本在地菁英，則透過大同學院，成為滿洲國官員的主要來源。這種統治手法，在中日戰爭期間中國內陸的日本統治地區亦能看到。蔡龍保的論文是以一個在臺灣成立壯大的合名會社——太田組為例，探討日本資本在臺灣的在地化經營。太田組可以說是日治時期臺灣土木建造業發展的縮影，該文可以修正涂照彥的看法。涂氏認為日本殖民統治就是日本的壟斷資本和本地資本的並存，但從蔡龍保對太田組的討論中，可以了解涂氏對日資與臺灣的定義過於平面。林滿紅則從移民的角度探討臺灣1930年代的對外貿易。中日戰爭爆發後，臺灣在日本占領地區有更多的發展空間，但是隨著滿洲國的成立，臺灣在中國的市場反而一度萎縮，不過，在日本本土的貿易額都有長足增長。陳慈玉則以中日實業公司為例，探討戰前中日實業公司在中國的經營。中日實業公司在中國的規模，可與滿鐵相提並論，但是，其經營效益並不如預期，究其原因，是因為中日實業公司無法如滿鐵那樣具有統治上的優勢。中日實業公司的成敗，在一定程度上取決於中日兩國的關係，而在1920年以後，中國民變不斷，日本經濟亦不見起色，加上中國各地反日情緒高漲，最終讓中日實業公司失去1910年代的榮光。

叁、評論

綜觀此書的鋪排，對於中日關係的各方面做出許多甚有啟發作用的創見。不少作者之論文為其長期所關注之研究課題，如鹿錫俊、陳慈玉等人的論文都是其所專精的研究課題。同時亦有一些是近來頗受關注的議題，如趙軍的論文就收入

其新近出版的專著中。¹再以王晴佳研究為例，他探討日本近代史學在經歷西方史學專業化的過程之中，如何與日本傳統史學有所折衷，而這種經過折衷的新史學，亦深刻影響著中國近代史學。

除此以外，亦有不少課題可以進行更進一步的探討。例如在黃自進的論文中就提到孫文和蔣介石思想的日本因素。該文所提出的問題，亦可以用於其他稍欠知名度的中國人士身上，如同趙軍論文所提示者：中國各地旅日同學會的行事作風深受日本影響。而隨著中國方面日記史料的陸續出版，其中亦有不少人士具有留日經驗，如常熟士紳徐兆璋就是一例，在他的日記中亦有不少關於其留日期間的記載。與孫文一樣，他亦受到明治後期政治運動蓬勃發展之影響，並思考如何應用於中國。他特別留意到日本地方自治運動的發展，並注意到江木翼所寫的《地方自治模範》一書。²其後，他向同鄉友人推薦此書，並謂：「《地方自治模範》一書甚佳，三村成績大可仿行，叔購閱之否？」³在該書的閱讀過程中，他進而證明諮議局在地方政治中的可行性。⁴

民國建立以後，不少地方人士亦以日本作為取經學習之地。不少人士前往日本甚至臺灣等地，進行各式各樣的考察，以作為地區近代化的借鏡，如福建省就是一例。⁵從這些參訪活動之中，可以了解到「日本因素」如何影響到中國地域的近代化，進而成為中國人士作為建設地方社會的「範本」。不過，要分析「日本經驗」對於中國地方社會邁向近代化的作用，仍需要更多個案研究來加以論證。因此，如何從各種材料中找尋這些事例，以豐富對這些為人忽略的細節之認

¹ 趙軍，《中国における大アジア主義：「聯日」と「抗日」のあいだ》（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2018年），頁173-250。

² 「《地方自治模範》為日本法學士江木翼調查彼國三自治模範村之成績所著。三模範村者，千葉縣之源村、靜岡縣之稻取村、宮城縣之生出村也。……」見徐兆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璋日記》，第2冊（合肥：黃山書社，2013年），1908年1月13日，頁826。

³ 徐兆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璋日記》，第2冊，1908年1月18日，頁827。

⁴ 「地方議會為諮議局之原本，而地方自治又原本之原本，惟值此過渡時代，人民程度不齊，若必按定法理，從下級自治入手，較多扞格之處。查日本地方議會本有扶植下級自治團體之責任，並籌度下級自治團體設立之方法，今該紳等先行設立地方議會，正與此意相符。」徐兆璋著，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璋日記》，第2冊，1908年1月23日，頁829。

⁵ 林文凱，〈日本治臺經驗取鑑：戰前福建官方的臺灣調查與考察活動之分析（1911-1933）〉，《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01期（2018年9月），頁117-155。

識，值得有心人士加以費心。

再者，本書的一大特色即為探討中日兩國群體之間的互動，以及對於中日關係所造成的影響。不過，若要以群體作為認識中日關係的切入點，或許會局限對於複雜歷史的認識。蓋因後人對於歷史的認識，往往基於各種框架而加以分類，這點放在中日關係史的研究上亦然。但是在中日關係史上的許多人物，涉獵許多領域，並不能以單一領域作評斷。如上海士紳王一亭在中國近代佛教史上甚為有名，亦在慈善事業上頗具聲名，⁶而他在藝術上的造詣，亦成為日本文壇人士前往中國拜訪的對象之一。王一亭與日本各界人士的關係素來友好，曾前往日本祝賀大正天皇繼位，亦曾擔任日清輪船株式會社的幹部，也是中日實業公司的早期成員。⁷就此而言，如何定位王一亭的角色，實值得研究者再三思量。

最後，在史料上有更多可以運用的來源。比方大正至昭和初期的日本報紙期刊，在內容上都表現出對於中國事務很大的關注。例如東亞同文會所出版的刊物，多為記載日本人士對於中國時事的觀察，亦能提供許多有關中日關係史的相關材料。⁸從這些刊物之中，可以掌握到日本對於中國時事的立時反應。又例如東亞同文會的會刊《支那》經常就中日關係提出見解、水野梅曉所創辦的《支那時報》收入不少中國人士所撰寫的文章，從這些文章中，又可以看到中日兩國思想潮流的對話。⁹

本書的許多論文，可以提供更多的思考方向，以為後學參詳。就時間斷代而

⁶ 康豹，〈一個著名上海商人與慈善家的宗教生活—王一亭〉，收入巫仁恕、林美莉、康豹編，《從城市看中國的現代性》（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0年），頁275-296。

⁷ 「中國興業會社倡議已久，原議以上海商務總會為中心，而由南方偉人為之股東，推孫文為總裁，日人倉知氏為副總裁，王一亭、張人傑為幹事。」見〈緊要新聞：中日企業公司之前途〉，《時事新報》，上海，1913年12月20日，版2。

⁸ 關於《支那》的介紹可參見石田卓生，〈東亞同文書院・東亞同文會逐次刊行物解題〉，收入三好章編，《アジアを見る眼：東亞同文書院の中國研究》（名古屋：あるむ，2018年），頁141-149。其詳細之目錄則可參見東亞文化研究所編，《東亞同文會機關誌・主要刊行物總目次》（東京：霞山會，1985年）。

⁹ 如水野梅曉將胡適的〈我們走那條路？〉翻譯為日文，並以〈支那改造の根本政策〉為名刊載於《支那時報》中。見胡適，〈時事論叢：支那改造の根本政策〉，《支那時報》，第13卷第6期（1930年12月），頁9-20。

言，本書所涉及的年代雖從1880年代至1940年代，然就議題的集中性而言有所不足，無法令剛進入此領域的研究新秀了解到中日關係的整體面貌。不過，在同時期出版的一些論文集中，已經有由各領域的專家學者就中日戰爭關鍵的1930年代進行通史性的敘述，¹⁰ 若比較其優劣，則各有擅場。本書通過以專題方式的鋪排，實已足夠使研究者以此書作為進入該領域之門檻，並進而拓展更多可供探討的空間。

¹⁰ 中村元哉、波多野澄雄編，《日中戦争はなぜ起きたのか：近代化をめぐる共鳴と衝突》（東京：中央公論出版社，2018年）。